



“我们有一天会做朋友”

——《死去的太阳》与巴金的道路 □樊迎春

从一个杜大心或吴养清式的“怜悯的人”变成王学礼式的拥有“人的怜悯”，或许才是“会做朋友”的那“一天”到来的契机，是真正意义上的“死去的太阳”变成“新生的太阳”。



巴金

《死去的太阳》是巴金的第二部文学创作，之前只有一部在法国期间完成的《灭亡》、《新生》虽然被看成是《灭亡》的续篇，创作时间却晚于《死去的太阳》。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行文叙述等角度看，《死去的太阳》相较另外两部也显得较为单薄粗糙，但在巴金的整个创作生涯中，《死去的太阳》第一次直接触及工人运动题材，且有真实的历史史实为依据。也是在这部作品中，巴金奠定了之后创作的普遍基调，即矛盾痛苦挣扎中却不乏光明的信号。这并非什么创意之举，却是巴金的主义信仰与创作实践间的对抗与调和。

讨论《死去的太阳》前需要简单回顾《灭亡》。《灭亡》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是巴金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同时也是一个对世界和时代充满浪漫夸张想象的革命青年的表白之作。巴金本人后来曾回忆《灭亡》的创作动机，表示只是因为彼时在异国他乡郁闷寂寞，为了缓解乡愁提起笔来，并未太放在心上，直到持续接到大哥的来信说些希望他“扬宗显亲”的话，他才觉得有必要借文学创作向大哥表白心迹，“如果他读完以后能够抚着我的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罢，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的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在我是满足，十分满足了！”于是有了杜大心的形象，有了巴金最早的对于革命现实与行动的书写。《灭亡》的结尾，心灰意冷的杜大心选择完成“献身”，这显然和巴金的信仰与思想有关，但巴金将流血牺牲这样的少年意气赤裸裸地告知供养他生活、对他寄予厚望的长兄，在传统文化意义上讲其实是“大不孝”，彼时年轻而性情激烈的巴金恐怕无暇多想，对现实与革命的理解也较为粗浅。《灭亡》全文充斥着青年知识分子的怨怼、不安与愤慨，与其说是记录青年人的革命过程，不如说是展现了青年人在爱情、工作与生活中的诸多不满与矛盾，巴金对“革命”活动的理解停留在发传单、写文章、集会讨论等，这也是他个人在去国离乡之前的主要社会经历。

巴金虽然将杜大心设定为参加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但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具体事项显然并不熟悉，这也就使得他在回国后的30年代初，面对彼时整个社会的氛围多少有些隔膜。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在历经了五四落潮和大革命失败的冲击之后，知识分子多有沉溺于消极忧郁情绪之中者，但更多的是奋起重寻未来出路的仁人志士，而彼时社会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在思潮中成长并已经度过草创初期艰险的中国共产党和日益壮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开始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巴金自少年起信仰的便是社会主

义思潮中的互助、正义、牺牲，这一主义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包括蔡元培、毛泽东在内的众多重要人物早年都是其重要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拥趸，蔡元培也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滋养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理论，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命题，虽然蔡元培最初将劳力者、劳心者都划归“劳工”作为完善人格的必要，但到了20年代末，政治局势的持续变动使得社会氛围普遍左倾，这便使得“劳工神圣”成为一种对“劳工”，尤其是对底层工人进行着重关切的政治正确。巴金在这样的情境下回到上海，并未取得任何法国的学位，也并未习得任何可以“扬宗显亲”的技能，只是多了不少革命与斗争的经验，他也确如夏志清所说，“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甚至可以说宗教狂热——的人”，此时拯救生民于水火，开创一个理想新中国便是巴金的“宗教”，于是便将书写的目光集中于以工人为主体的五卅运动也算是水到渠成。

首先需要讨论的，也是主人公吴养清最关切的，即工人运动。根据学者张全之的研究，巴金真正意义上描写工人运动的小说只有《死去的太阳》和《雪》两篇。《死去的太阳》是巴金最初的尝试，此时距离《灭亡》的创作过了大概两年，那个在痛苦矛盾中挣扎的“杜大心”也有了不小改变，成长为看起来较为成熟稳重的吴养清。在小说中，巴金赋予了吴养清一定的身份背景，他是“受命”前往南京的，但这一人物显然更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巴金本人的化身，他亲眼目睹了上海的血腥大屠杀之后一心寄望于南京罢工运动的另一番景象，结果却也事与愿违。值得注意的是，吴养清的失望并非建立在革命行动的外在挫败，而是出于对底层工人生活困苦的人道主义同情。巴金其实把握住了当时社会环境下工人运动的本质难题：反抗和斗争当然是必要的、正义的，但在这种必要和正义得到完美实现之前，因为罢工失去收入的普通工人已经饱受折磨，甚至饥寒交迫而死；如果顾及当下的温饱而屈服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榨，又无异于饮鸩止渴，长远看必定导致各个阶层的苦痛。面对这样的困境，“吴养清”又变成了“杜大心”，失望、

焦虑、痛苦，而这代替“杜大心”去献身的是李阿根，而与此前简单“灭亡”的结局不同，这次在献身火海的李阿根之外，多了一个革命的“启蒙者”。

“但是你一定要听我说清楚”，吴养清哀求地说，“我并不是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我并不是欺瞒工人，然而我不能看见工人那样地挨饿。如果我是一个登记工人，我也许会反对复工。但是现在我自己吃顿饭，我不能够看人家牺牲。你现在可以了解我，可以原谅我罢？”

王学礼突然转过身子，用他颤抖着的大手紧紧地抓住吴养清底右手。吴养清看见他底眼角里各嵌着一滴大眼泪。“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是没有原谅存在的。也许我不了解你，但是你不了解我。你不能够了解我们工人。你只知道怜悯，然而我们工人所需要的却是超于怜悯以上的东西。除非你是一个工人，我们就永远不能了解。”

“超于怜悯以上的东西”是什么，巴金没有继续讨论，或许是“劳工神圣”的荣耀，或许是无政府主义者追求的平等与尊严，但此时，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下，“工人运动”的主体“工人阶级”俨然成为全新的主人，成为最可依靠的力量。五卅惨案后的群众运动最终也被证实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于上海发源后席卷全国，并从工人发展到包括学生、商人、市民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一时间风起云涌，拉开反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浪潮的序幕。可以说，这一运动之所以彪炳千古，正在其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发动了工人群众，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可以且应该领导革命的合法性所在。然而，此时的巴金是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安排给王学礼的结局也依然是“杜大心”式的，即便多了两年的历练，即便隐约意识到了“怜悯”之上的东西的存在，却还是无法更进一步，无法认识到在人道主义的怜悯以外，真正可以改变工人生活现状与广大人民群众反抗状态的组织性与制度性因素，无法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对“劳工神圣”的批判性解读，无法理解党群关系对工人运动成



败的决定性影响。换句话说，巴金的视角始终是外在的，“如果读者觉得我的英雄有点幼稚、滑稽，那么请他明白小资产阶级大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巴金依然在写“自己”的故事，在写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现实真相的激烈碰撞。虽然在强调“我相信了大众底力量，我们会走到那里的，至少我们底弟妹们会走到那里”，“望着这许多面旗帜和大队的群众，他感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底来临”，然而最终却不得不面对“在同一个运动中他们只是演讲、发宣言、拍通电、作文章，而别的人却在受苦”的事实。巴金的叙述视角虽然从《灭亡》中的过度关注个人转移到了对历史现实的着重关怀，采用的书写手法还是陈旧的，依然是浪漫化的革命想象与深情而不得的恋爱相结合。于是在小说结尾，使得吴养清振作起来的，是恋人和同志的死

■第一感受

从宋词中走来的李清照

——评小说《李清照》 □周大新

初闻家乡作家郑洁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李清照》，不觉惊奇。

李清照为千古第一才女，灵秀聪慧，少有才名，备受嘉许；豆蔻年华，细嗅青梅，柔情无限；帘卷西风，人比花瘦，才貌惊人。她是词国皇后，词章无人超越，经历国破家亡，始终含笑向前；高雅不俗，敢爱敢恨，爱花爱酒爱人生。但她的一生太多大悲，令人叹惋。

但凡文人，心中皆有李清照。可史料欠缺，创作难度大。因此，涉李清照的小说少有人探索。阅读郑洁的小说《李清照》，总有不解的惊喜，甚想抒发感慨，只为那绿肥红瘦，海棠依旧！

大国人才济济，向来不乏写作妙手。郑洁据史推断，以丰富的想象力、超拔的创造力，描写出李清照曲折的故事，将千古才女的生平融入宋史的洪流，并如数家珍般信手拈来，从镶嵌玉的首饰学问，到水色澄明的衣着乾坤，一一陈于读者眼前，我唯有拍手称赞。

小说以北宋党争为背景，从李清照与赵明诚相遇起笔，将史上这首爱情绝唱描绘得缠绵悱恻，曲折生动，扣人心弦。

李清照的少女时代，由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变法引起的党争越演越烈。追随恩师苏轼、归属旧党的李格非，峻拒女儿接近敌党（新党）。明诚父赵挺之乃蔡京门生，归属新党。因此，李清照与赵明诚相识、相爱到婚配，所经的艰难可以想象。

小说中的李清照命运多舛，新婚即被高门大户的赵府排斥，幸福时光转瞬即逝。在激烈的党争中新党完胜、旧党溃败，权奸蔡京刻党人碑，将司马光、苏轼及苏门弟子尽归“奸党”。李清照父李格非被下狱，明诚父赵挺之被撤职为副相。又有“宗室不得与奸党结亲”的圣谕，赵家以一张“和离书”棒打鸳鸯。双十年华的李清照被休，又遭仇家劫持，充作官奴卖于萧关，沦为妾。

赵挺之又与蔡京争权，几番沉浮，最终惨败，死于牢狱。赵家满门获罪，罢官削职。逃出萧关的李清照不计前嫌，远赴青州，与明诚续续前缘。

赵家没落，出身于汴京皇族的老夫人郭

氏，将雄起的希望寄托于女儿赵婉身上。赵婉嫁到明州史家，史家一门三宰相，四世八公卿，实力雄厚。后经赵婉夫妇周旋，赵明诚三兄弟重被起用。李清照随夫偕唱，夫妻俩在联金伐辽、靖康之乱中救助百姓、安置灾民、募兵抗敌、保卫汴京等，彰显出浓厚的爱民爱国情怀。

赵明诚死后金兵入侵，建康沦陷，李清照为保护爱夫的遗物（金石）逃亡，颠沛流离，再嫁、讼夫、入狱，不屈不挠地与世俗社会及封建势力作斗争。身处险境，依旧胸怀天下，惜贫怜弱，变卖首饰救助穷人、向岳家军资助军费等，为后人奉献了一首生命的绝唱。

小说有儿女柔情，有铁血风骨、恢弘大气。郑洁在对才女的命运描写中，将北宋党争、大宅乱象、后宫纷争、联金伐辽、靖康之乱、宋金对峙、二圣被掠、建炎南渡、金祸江南、岳飞冤死、绍兴和议等历史细节，展现得精彩纷呈。

郑洁比较擅长书写女性，笔下的李清照活灵活现，其他女性也形象饱满：强势、桀骜的相府千金王月新；由宫婢变身徽宗皇后的郑廷；为改变命运冒充名宦，成为徽宗“吴婕妤”的丫鬟秋菊；由渔女变身赵构皇后的吴芍药；由郑廷侍女变为太后的韦薇；以及帝姬赵嬛嬛、名妓李师师等个性突出的古代女子形象。她们都在生活的巨浪里挣扎、沉浮，百折不回。

尤敬小说中的赵明诚，身为皇亲贵胄，痴情重情，冠绝古今。在那个“三妻四妾”时代，他是宰相之子贵不可言，与清照“和离”后数年，竟谢绝一众名媛，坚守对才女的挚爱。后主政一方数年，亦无纳妾，足见对才女惊天动地鬼神般的爱情。关此，史载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有详尽交代：……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至于小说中出现的紫儿、赵士程母子，也是缘由曲折，合情合理。

郑洁一边浓墨渲染南北宋风云，一边描绘了惊世骇俗的男女之情，将这部鸿著打造得词工句丽，充满张力。北宋党争风骤雨疾，南宋抗金壮怀激烈；宅斗官斗步步惊心，御敌战争变幻莫测。人物形象丰满，故事曲折跌宕，读来荡气回肠。

当世俗的挤压、嘲讽、质疑、攻讦朝我们



无情劈来的时候，我们只有接受命运的考验及灵魂的蹂躏。我们痛楚、惊恐，也要拼死一搏，以图冲破障壁、挣脱枷锁。我们悲伤、凄凉，却要摆脱羁绊，以图揭开荒诞、回避残酷。我们向往光明、热爱明天，便要浴血奋战突出重围，与命运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弈。

小说里的李清照便是女性的典范，在诬蔑、陷害、颠覆等各种打击中存活下来，活成了一位爱国才女，为世人奉献了一首千古绝唱。

我想，但凡经历过人生低谷的人，看了《李清照》，一定会灵魂激荡。但凡李清照“铁粉”，都会感谢郑洁。她不辞辛苦、呕心沥血，把千年前的才女唤回现实，让读者闻其笑、见其泪、悯其悲、感其痛，敬慕其卓不凡！

小说中的李清照令人赞叹，经历种种苦难，笑傲风刀霜剑，守着高贵灵魂，穿越时代风云，姗姗来到读者面前。

小说中的李清照令人敬仰。经历太多曲折，包容太多情感，才华超凡绝世，品性旷达坚毅，情致丰厚深婉，为世人树立了诗词丰碑、才智丰碑、女子尊严的丰碑。

这是小说《李清照》的成功之处。正如柳建伟所言：郑洁创作了一部爱国才女的史诗，为读者奉献了一场形神兼备的文学盛宴。可喜可贺。

■短评

时代的微小与宏大

——读聂泓《离离原上花》有感 □汪雨萌

在2021年读到聂泓的《离离原上花》，我内心的感受是很复杂的，经历了奇幻的2020年，对全球化的反思似乎已经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世界性主题，而聂泓小说中的“中国制造”所经历的跌宕起伏正是这一主题的经典注脚。小说以林家钰、林晨父女二人的创业史为主要线索，讲述了中国纺织服装制造业的出海小史，回顾了全球化进程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和助力，也书写了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更将视线聚焦在外贸这一中国当代文学中较为罕见的领域，以其对对外贸易的了解，对外贸人命运与心理的摹画，从细分领域对改革开放这一宏大命题作出了新的书写。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改革开放是可以反复拿来言说的命题，也是当代中国宏大叙事最青睐的主题之一。自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直到当下《大江大河》等热播剧的出现，热血、颠覆、冲突就从未在改革开放的叙事中退潮，在叙事上也越来越偏重像群像式的人物关系、跌宕起伏的故事结构，创作者的创作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也始终专注在故事背后世界、国家、社会的变革与激荡上，个人的关系、情感、命运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工具化，自觉地为这些壮丽的命题做好服务。然而聂泓却并不是如此理解，《离离原上花》一共分为7个章节，每一个章节的标题都很“小”、很写实，如“相依为命”“游学英国”等等，她没有那么多的宏图远景，没有那么深谋远虑，她想写好的只是改革开放燎原之火中的一颗小火种。聂泓的目光从未从个体的命运上离开，这里的个体不仅仅是指林家钰、林晨这些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拼搏厮杀的人物形象，更是安佳公司这样在对外贸易中占有小小席位的民营企业。私企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会经历怎样的困难？面对外贸生意他们如何洽谈、如何安排生产？如果合作陷入僵局，人微言轻的小小私企又该如何突破和解决？在这些生意的细枝末节上，聂泓是投入了大量笔墨的，她笔下的创业细节生动又可靠，甚至连出海货物被扣押如何联系码头、海关予以放行，服装企业如何注册、发展自己在电商平台上的账号，都写得清楚明白。改革、创业不像爽文，只需一步步打怪升级，制造企业所面临的很多困难，也并不像故事成规给主人公所设置的障碍一般，总有打开的金手指给他们解决，聂泓的小说给我们展示的可能并不是改革开放宏伟的灿烂画卷，更多的是构筑中国制造这一招牌背后小企业的艰辛时刻。正因为很多问题是无解的、崩溃的、摧毁性的，很多机会

是微弱的、转瞬即逝的、千钧一发的，更显示出安佳公司坚韧、顽强的草根气质，从个体、微观的角度，形成了书写改革开放的另一种可能。

如果认为聂泓的小说只是换了个角度，从宏观图景的波澜壮阔转向个体故事的跌宕起伏，那就错了。虽然如前文所述，聂泓笔下的安佳公司经历过滞销、火灾、缺货、扣货等一系列的危机，但小说的故事却仍然是平和绵延的，她并没有设计过多的悬念，没有安排激烈的冲突，她的焦点根本就不在这里。相比起如何制造冲突、带动叙事高潮，聂泓的创作心态似乎更像是真正地经营安佳公司，她的写作重点永远在解决问题与平息矛盾上。在安佳公司的情节上是这样，处理女主角林晨的个人感情与生活也同样如此。林晨对待公司的态度是勤奋、务实而稳健的，但她的个人生活却处处横生枝节。她年幼丧母，独自一人带大妹妹，少年时考上北大却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就读，接手公司就被纨绔富二代追求，追求不成便以阻断公司合作相威胁，去英国留学被开明的华裔青年追求，却又因他父母的阻挠而分散，回国后发现已怀孕，就毅然决然地独自把孩子生下来，公司蒸蒸日上时妹妹得了尿毒症……这些情节随便哪一个稍稍展开，都是复杂狗血、淋漓尽致的生活剧，但聂泓对它们的处理却如林晨的个性一般丝毫不拖泥带水，她的叙事重点不在人物的内心戏，她写的都是实打实的解决办法，但包括林晨在内，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父亲林家钰、妹妹林曦、爱人郝嘟嘟、继母杨雪丽都在这种解决、处理中展现出中国人面对生活与命运时特有的性格底色，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尽人事，听天命，他们会低落，会彷徨，但绝不会放任自己陷在生活的低谷与泥淖里。《离离原上花》中的日常生活是有力量的，她虽然没有细细描绘日常生活中那些缠绕复杂的枝枝蔓蔓，会有人觉得她的故事不够细节，不够曲折、不够贴近，但也许这些细节只是日常生活的泡沫，对命运、对人的支撑是有限的。日常生活力量在于人的命运、人的生活，以及在生活展现出的，一如安佳公司一般的强韧的心气与层层泡沫之下驯服命运、整理生活的行动力。她的故事、人物也许失于细节，但她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抓住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力量与脉搏。

《离离原上花》的封面上有一行题记：“其实，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她的故事落在微处，可她的故事也在别处，也许这又是另一种宏大呢。